

# 文史资料选辑

1981

第一辑

6

2:1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

责任编辑 王有为  
封面装帧 范一辛

**文史资料选辑**

1981年第一辑(总第三十五辑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

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5.125 插页 2 字数 112,000

1981年6月第1版 1981年6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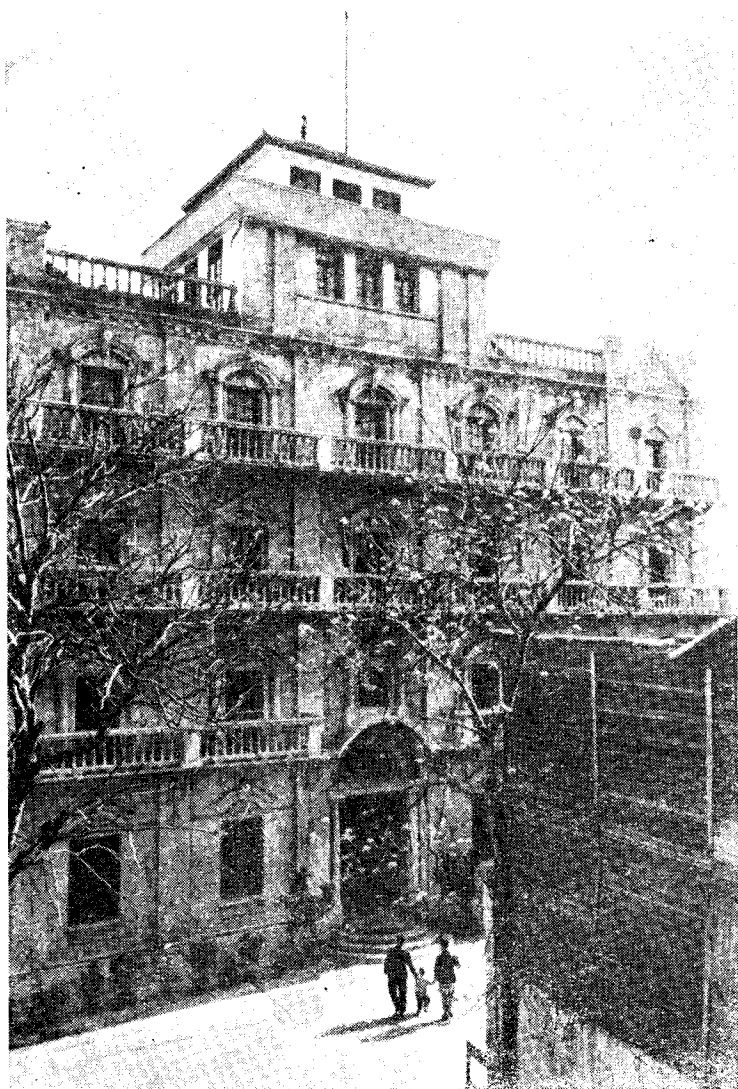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 1—12,300

书号 11074·488 定价(六) 0.55元

内部发行



恽代英烈士像  
1927年3月10日摄于汉口



八·一南昌起义的指挥所，原为江西大旅社



上海大学的临时校舍设在闸北青云路师寿坊

一九三五年十二月，上海文化界馬相伯等二百八十三人聯名發表救國宣言，成立文化界救國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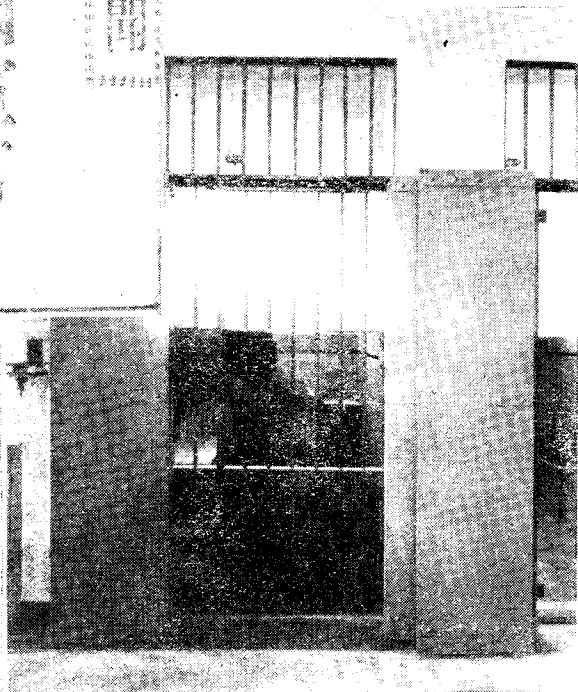
本市新聞

馬相伯等二百八十三人

聯名發表救國宣言

主張下最後最大之決心  
堅持領土和主權之完整

馬相伯、王士珍、江朝樞、沈鈞儒、周建人、周子同、孫震冰、辜乃器、陶行知、陳高、傅、楊、顧、李、楊、徐、馮、邵、顧、戴、唐、茂、如、壽、毅、成、鄭、振、鐸、蔣、維、喬、蔡、元、培、諸、君、來、等、二、百、八、十、三、人、昨、聯、名、發、表、救、國、運、動、宣、言、主、張、下、最、後、最、大、的、決、心、堅、持、領、土、和、主、權、的、完、整、同、時、以、上、海、文、化、界、救、國、會、名、義、致、電、中、央、政、府、及、北、平、政、府、。



上海西牢內部獄室

# 目 录

##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

- 八一起义前后 .....靖任秋( 1 )
- 立三路线与行动委员会 .....陈修良( 11 )
- 恽代英同志在安徽第四师范学校 .....郑维辅( 21 )
- 四·一二事变中在上海的见闻 .....童奎芳( 26 )
- 项英同志与上海二月罢工.....蒋自强、许维之( 33 )
- 上海西牢回忆 .....李守宪( 40 )
- 参加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前后 .....张承宗( 47 )
- 怀念刘长胜同志.....郑玉颜 遗著( 67 )
- 回忆刘长胜同志对地下交通员的培养教育··贺崇寅、姚明达( 80 )
- 地下交通线 .....曹 达( 90 )
- 上海大学始末.....周启新 遗著(110)
- 《文萃丛刊》出版发行记 .....沈峻坡(129)
- 忆殷夫 .....张雪痕(139)
- 苏州东山起义 .....席玉年、唐坚柏、让嘉谟(144)
- 上海舞潮案 .....金 淦(152)

# 八一起义前后

靖 任 秋

用革命的武装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，这是我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特点。我参加革命队伍以后，一直过着军人生活。只是由于机缘不同，自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之后，党分配我长期隐蔽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国民党部队中做兵运工作，特别是做上层和接近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。

我的回忆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以后进黄埔军校写起。事隔几十年，记忆中可能有疏漏或错误之处，尚望同志们补充和订正。

## 一、进黄埔军校

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时，我在南京东南大学旁听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这年年底，党决定我进黄埔军官学校去学习，当时，组织上还介绍两个同志与我同行，一位是江西人姓熊，他原是黄埔第一期学生，学校派他到北方活动，任务完成后回校，另一位是台湾人，现在我已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了。一九二六年二月，我们一起从南京出发，由上海搭轮船到广州。那位台湾同志远离家乡，经济很困难，熊同志带的钱也不多，我身上也只有二、三十元，坐火车到上海，再住旅馆，买了船票，剩下的钱仅够在船上买饭吃。当时轮船

还不能直接到广州靠岸，只能先到黄埔，轮船停泊在珠江江心，还必需离轮船到民船上过夜，等第二天再雇小船到广州上岸。我们三人到达黄埔时已身无分文，处境困难。幸而同行的熊同志先找到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同志（他是周恩来同志离黄埔军校后的继任者），由他接济几元钱，使我们才得雇小船到广州，找到了总工会，凭组织上的介绍信，安排住进总工会。许多向往革命的青年历尽艰难曲折来投考黄埔军校，我们的遭遇也不例外。当时正是中山舰事件之后，首次国共合作由于蒋介石的阴谋破坏已出现裂痕，但在表面上仍保持两党合作局面，广州市面上还算安定。

在广东未统一以前，陈炯明还盘踞东江一带，广州附近基本上掌握在旧军阀杨希闵和刘震寰手里。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生毕业后，第二期与第一期相距时间不长，三期距二期毕业也仅有一年。那时以黄埔毕业生为基础，开始建立教导团，即教导团第一团和第二团，这是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队伍，成为讨伐陈炯明、平定东江的主力部队。回到广州，就发生杨、刘叛乱，教导团未经休整，即再鼓余勇，投入战斗，消灭了杨希闵和刘震寰的部队，从此声威大振。当时广东国民政府还有李济深、谭延闿、朱培德、程潜、李福林等部队，不过力量都不大。这两次战役对统一广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，教导团在两次战役中的光辉战绩，建立了黄埔军校的威望。

蒋介石以办黄埔军校起家，他在国民党内取得一天比一天高的地位，与教导团在统一广东时的贡献不可分，因为他是校长，学生的功绩都记在他的帐上。当时军队中的骨干多来自黄埔，而在历次战斗中表现比较突出的又大都是共产党员。蒋介石看到这点，就打起主意来，蓄意制造了中山舰事件。舰长李之龙是黄埔一期学生、共产党员，原是蒋介石比较信任的，提升也较快。因蒋经常住

在黄埔，平时中山舰往来于广州与黄埔之间，逢到调动，总是临时升火。一九二六年三月九日，中山舰奉到蒋介石的命令从广州调往黄埔，而蒋介石却诬称：这是“擅自移动，图谋不轨”，把责任推给共产党，并借此扣留了李之龙，故意夸大其事。以此为借口，他要求部队和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必须公开身份，并撤换重要岗位上的共产党员。对此，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居然表示同意，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。周恩来同志原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，也就在此时离开黄埔。

我到黄埔后，组织上决定不公开我的党员身份，当时党内部分同志已认识到公开身份这项决定是不正确的。例如，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公开以后，就不能在黄埔军校进行公开活动了。我进黄埔军校时，党员身份就不公开了。黄埔军校的教育过程分两个阶段：进校后首先当入伍生，实际上是锻炼我们过紧张、艰苦的军营生活。当时入伍生各团设在广州北郊白云山麓，靠近黄花岗和沙河镇。沙河镇上的沙河粉是很有名的，附近的山岳叫瘦狗岭，军校在那里搭了几排席棚，我们这批入伍生就在那里吃饭、睡觉、受训，过兵营生活。席棚里的床铺是用竹子搭成的双层床，布置得井井有条。入伍生阶段就是教育我们习惯于过军人生活，严肃、紧张，动作迅速、整齐。清早听了军号声，立即起床、穿衣，佩带枪支、子弹、水壶，只给十五分钟。吃饭也要听口令，不得先吃，十分或十五分钟以后，又喊“立正”，即使尚未吃完也不能再吃了。每天的日程安排得很紧凑，出操之前，先跑步半小时，枪、子弹、水壶都带在身上，广东天气热，要不了半小时，眉毛上的汗水几如雨滴，不喊“稍息”，谁也不准乱动。上午出操完毕，下午还要打野外，爬山时还要“冲锋”，列队回校时又要跑步。整天的操练，军衣都是汗湿的，连子弹

带也是湿的。吃饭前后，都是一身大汗，经常跳进沙河去洗澡。这样刻苦锻炼身体很不错，如今年岁大了，还深感这种锻炼的好处。

入伍生在沙河有两个团。我记得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是在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，誓师大会由教育长方鼎英主持，我们都列队参加。当时要在入伍生中抽选一个中队（等于一个连），进军校作为第四期学生，我也被抽去编入政治大队第四队，进校后不久就参加北伐。进军校后，党组织给我的任务是负责组织校内的国民党左派，与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。这种斗争在黄埔军校一开始就存在着，国民党右派的根子是西山会议派，他们在军校组成了孙文主义学会，当时离校的黄埔学生也有个组织叫青年军人联合会，这是由我党领导同右派进行斗争的外围组织。此外，还有一个黄埔同学会，由蒋介石自任会长，这个组织对黄埔毕业生的安排和使用有很大权力。当时部队中的提升程序是这样：军校毕业，先当准尉见习，几个月后升少尉排长，再过几月提升中尉，最后当上尉连长。如果进黄埔同学会工作，一进去就是少校军阶。左、右两派在黄埔同学会内斗争极为激烈，蒋介石所信赖和依靠的始终是国民党右派。我记得当时黄埔同学会的秘书长曾扩情（四川人），就是蒋的亲信。中山舰事件以后，蒋介石要共产党员公开身份，停止活动，同时取消孙文主义学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两个组织，仅保留黄埔同学会这个组织，实际上孙文主义学会的活动更加猖狂。因此，我们当时和国民党右派斗争也涉及到在黄埔同学会中的斗争。

当时军校中的党员同志，虽然由于身份公开，活动受到限制，但他们与广大同学特别是与国民党左派仍保持广泛联系和影响。军校成立有特别党部，是由学生选举产生的，它对学生的领导工作有重要的作用。不久，我被选进特别党部监察委员会，以后我们逐

步取得了特别党部的全面领导权,活动范围开展到广州市,同时学校左右派的斗争也日益加剧。蒋介石在北伐进军江西以后,还不断有电报到学校,关心校内两派斗争的发展。

## 二、北伐到武汉

一九二六年十二月,我们政治大队第四队调出来,参加北伐,当时北伐军已到达武汉。我们一起从广州坐火车到韶关,再往北铁路还不通。出韶关,翻越九峰山,就到湖南衡阳。行军途中,路过几位同学的老家,备受亲切、热情的招待,至今记忆犹新。北伐军刚从广东出师湘、鄂两省时,纪律严明,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。记得过长沙时,我曾受邀至湖南长沙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去演讲,那天我仍穿一件从广东出发的单军衣,里面只有一件棉线衫,在湖南的冬天穿这么一套衣服站在台上演讲,实在太冷了。听讲的人开始交头接耳,不久竟有人跑上台来,打断我的讲话,亲切地问我是否要再加件衣服?这种亲切关怀的情景,虽相隔几十年,至今还有深刻印象!可以看出,这是北伐战争初期的军民鱼水之情。

我们到武昌过旧历年。不久,广东国民政府迁到武汉。黄埔军校的全称是黄埔陆军军官学校,这时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,在武昌设立武汉分校,招收入伍生,编成入伍生一团、二团,还有一个女生队。

一九二七年初,我从军校毕业后,被留在军校政治部担任党务股长,负责特别党部工作。当时学校的政治气氛很热烈,蒋介石虽然名义上是校长,但一切由副校长恽代英主持,政治部主任周佛海,他当时还是共产党员,宁汉分裂后,才叛变逃往南京。总教官是施存统(后改名施复亮,当时也是共产党员),教务长是侯连瀛,虽

不是共产党员，但他倾向进步，是拥护党的。当然，学校中还有国民党右派，但他们已不是主导力量了。解放战争时期在淮海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军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，在军校时是国民党左派，由我介绍入党，一九三三年失去组织关系后，在国民党部队中当师长。有关他起义情况，当另文再述。

武汉分校的政治活动，也象在广州时那样发展到了学校以外。我们的社会关系经组织介绍，发展的面也是较宽的。例如，星期天我们经常在邓初民家开会，经常一齐开会的还有李汉俊等。黄埔同学会在武汉也成立了分会，我和曾钟圣同志（黄埔四期毕业，曾任《武汉日报》主编，在通南巴时遭张国焘杀害），共同负责黄埔同学会工作。蒋介石发动四·一二反革命政变，在上海屠杀工人，此时留守广东的李济深早已开始反共，他首先把矛头对准黄埔军校，我们不少同志甚至国民党左派都遇害牺牲。一部分人从广东逃到武汉，都由黄埔同学会负责收容并安排工作。

二次北伐，我们从武汉向河南进军，当时奉系军阀已占据河南，战斗很激烈，最后我们取得胜利，克复郑州。记得在武汉我们曾举行过追悼黄埔第一期同学蒋先云同志的大会，他是一位很好的团长，在河南战场上战死。当时宁汉关系紧张，汪精卫等已很动摇，而武汉兵力空虚，武汉卫戍部队只有叶挺一个团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湖南长沙发动马日事变，蒋介石策动夏斗寅部队进攻武汉，我们的部队正在二次北伐中，一时还不能从河南撤回，临时把武汉分校的学生编成两个团，加上一个学兵团编成一个独立师，由武汉分校教育长侯连瀛担任师长，归叶挺统一指挥，保卫武汉，讨伐叛军。队伍从武昌登车南下，只有两、三站，到土地堂即和叛军接触，一接触就把叛军许克祥击溃，跟踪追击到咸宁，叛军即向西南方向逃跑。

这里，咸宁县的县长也跑了，临时由叶挺部政治部主任陈兴霖（后改名陈子坚）当县长，叫我管公安局。叛军被打退以后，我们又回到武汉。武汉形势也有重大变化，宁汉破裂的形势已经形成。组织上认为我在武汉活动中过于暴露，通知我离开武汉，调到二十军贺龙所部，准备成立第三师，师长内定周逸群。我按组织上指示到了九江，这时东征部队也到九江一带。叶挺的二十四师建制归十一军，军长张发奎受汪精卫的指挥，他们要解决二十四师。叶挺据报后，即指挥部队迅速向南昌移动。当时南昌是第三军朱培德的地区，朱德同志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兼第三军教导团团长。

### 三、南昌起义之后

我到南昌后，组织上改变决定，叫我到二十四师政治部任组织科长，政治部住在南昌百花洲。没过两天，即举行著名的八一起义。这次起义事先经过周密的准备，经过短促的战斗，一夜之间，就把城内的敌人全部解决。我记得起义之日，上级命我带领政治部二十多人的武装力量，到百花洲出口处作自卫性防守，战斗很快就结束，我们在那里没有接火。在南昌缴获敌人的武器很多，由南昌向会昌、瑞金进军时，不分官兵都要多扛些枪支，我扛了两支步枪出发。八月的江西热得不得了，行军时汗流浹背，出南昌就是条沙河，过沙河时我们就热得走不动了。南昌起义部队向南开去，目的地是广东潮汕。当时想在广东建立革命基地，找个海口，争取得到苏联接济。

我们的部队刚出发，敌人就调动兵力，准备沿途截击。在会昌附近，与敌军钱大钧部一个师接触，一仗就把他们打垮，政治部清扫战场时，发现他们把家当都丢了，连钱大钧本人的马匹也被我们

俘获。到瑞金，我们刚住进城里，就受到敌军的包围，敌人盘踞在城外的小山上。我们把指挥所设在城墙上，可以看到敌军的活动。攻击令一下，我们即冲向城外小山，又把敌军打垮。离瑞金向福建移动，通过崇山峻岭，道路很坏，行军经古城到汀州，休息了两天。以后继续前进，在三河坝遭遇敌军的优势兵力，作战中我们两天连占三个阵地，最后发现敌军后续兵力很大，才决定撤退。

到潮州后，派陈子坚去当县长，我改任秘书，代理政治部主任。从潮州到三河坝，决定向海陆丰撤退。海陆丰是彭湃同志的家乡，有农民运动的基础。当时周恩来同志负责前敌军委，刘伯承同志负责参谋团工作。从三河坝撤到流沙，前敌军委在这里开会，我们稍作停留，下午三时，随军委指挥部一同出发。只走了十多里路，前面有小山挡路，突然发现敌情，就打响了。指挥部只有一个卫队连，想阻击敌人，势不可能，指挥部只能逐步后撤，让卫队连和敌人保持接触，幸而敌军没有追击。这一撤退又到了流沙村外，已是太阳快要落山。我见到贺老总，也只有几个卫兵，看到郭沫若在村外坐地。这时，天也快黑了，大家也就分散了。

当地农民受过农民运动的教育，对我们的态度很好，当天晚上由一个农民介绍我们住进一个祠堂，还为我们做了稀饭，第二天又派人送我们到汕头。当时敌军尚未到达，街上连警察都没有。又巧遇一位黄埔同学，他在校时是个中间派，一见面，他看我狼狈的样子就清楚了。幸而由他帮忙，为我买衣服和鞋子，找旅馆解决食宿问题，还给买了一张到上海的船票，我就这样从汕头到了上海。从汕头坐船赴上海时，船上见到很多熟人。陈赓、周逸群等都在这条船上，陈还和周逸群开了个玩笑，趁他不注意的时候，大喊周逸群如何如何，周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他。

进吴淞口到上海，正逢十月十日，看到两岸都挂起国民党的旗帜，心中痛恨难言，又想如遇到检查，很容易暴露，因为当时我们的脸都晒得黑黑的，如果脱去袜子，从两只爬山的脚上就会看出破绽。好在船到外滩，停在江心未靠岸，我们都是坐小舢板船上岸的。上岸后，先到我的一位老同学家暂住。不几天就遇到徐彬如，他是我的小同乡，在广州时我住黄埔军校，他读中山大学。找到他很快就跟组织取得了联系。

回顾八一起义，确有深刻的经验教训。南昌打响了第一枪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拿起武器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，点燃了武装斗争的烽火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这次起义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。在此以前，我们虽然也参加部队工作，但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，甚至在关键时刻放弃了已经拿到手的军队领导权。南昌起义取得胜利之后，当时还没有认识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，走农村包围城市，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，象毛泽东同志后来在井冈山所提出的那样。部队撤离南昌之后，一路上都打硬仗，虽然接连打了胜仗，可是消耗力量太大。其次，当时对兵源、弹药、给养的补充，也没有充分考虑，并没有明确认识到从敌人手中夺取武装，用以壮大自己的重要性。去潮汕找海口，找外援，当然也是需要的，但要分清主要和次要。

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份，组织上决定派我去苏联学习。可是动身的前一天接到通知，说组织决定在上海举行暴动，留我参加暴动，暂时不去苏联。那时上海属江苏省委领导，省委决定将在上海举行暴动，后来中央并未批准，暴动又中止。后来，我分配到上海总工会作工人军委工作，任务是教工人放枪和巷战，还是想等机会暴动。巷战我不懂，教放枪还可以，组织上还给我一支驳壳枪，我欣

然接受了这个任务。我和总工会平时接触不多，先租一间房子住下，组织上知道我的地方，有事派人跟我联系，只知道项英同志负责工会工作。当时和我一起留下的还有一位姓徐的同志，他是黄埔三期同学，南昌起义后，在贺龙部队当营长，南下进军途中受伤，到上海养好了伤，组织上就派他到无锡去指挥农民暴动。他很快就回来了，见面时告诉我，那里群众没有发动起来，参加暴动的没有几个人，就是他放了一枪。我在总工会工作，接触的工人群众也不多，可见群众基础很差，举行暴动是带有盲目性的。大革命失败以后，大家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感到愤恨，要反抗，要打倒他，但具体怎样干，却缺少缜密的研究和正确的方法，加上白色恐怖严重，党遭受了很大的损失。

后来我调到闸北区委工作。大革命失败后，上海地下党力量不大，同时，上海的政治环境已经很恶劣，白色恐怖也日趋严重。我在上海总工会和闸北区委工作的时间都不长，到一九二八年春天，被调到中央军委工作，这是周恩来同志亲自负责领导的，有时可以听到恩来同志做形势报告。有一次，他在报告中谈到，可能情况变坏，找不着组织，要各自为战。这次报告给我的印象很深，更其重要的是时隔不久，组织上派我去武汉工作，实践这个“各自为战”的方针。我在上海做地下工作阶段，就此结束。

（陈霞飞、陆诒整理）